

的庆典。四年后(1689年)康熙帝北巡塞外,又在围场北部的库尔奇勒河行宫(小滦河),听取了内大臣索额图、佟国纲等关于与俄方边界谈判情况的汇报,正式批准了《中俄尼布楚条约》。这就为集中力量平定噶尔丹叛乱赢得了时间。

当时,以噶尔丹为代表的我国西北部厄鲁特准噶尔部分裂势力,在占据新疆、青海、漠北广大地区之后,又侵占漠南蒙古,公然向清政府提出“皇上君南方,我长北方”的分裂要求。康熙二十九年(1690年)七月,噶尔丹拥兵十万人入内扎萨克,继而骚扰木兰围场北部的乌兰布通,逼近京师。康熙下诏亲征,从古北口和喜峰口两路出兵,直驱围场,于吐力根河,筑十二座连营。康熙坐镇波罗河屯行宫,部署作战方案。八月,清军与噶尔丹大战于乌兰布通。战场上,清军士气高昂,英勇拼杀,大败敌军。噶尔丹仅以数千骑亡命科布多。乌兰布通一战,消灭了噶尔丹的主力,其胜利正如康熙所言:“平时不忘武备,勤于训练之所致也”。正是出于这种原因,雍正虽因忙于巩固皇权的斗争,没有行围木兰,但依然强调:“后世子孙,当遵皇考所行,习武木兰,毋忘家法。”

乌兰布通之战后,清朝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。康熙三十年(1691年),清圣祖玄烨至木兰行围时,溯滦河北上,到木兰围场西北的多伦诺尔,在那里隆重召见喀尔喀左右翼王公,举行多伦会盟。根据喀尔喀蒙古王公的意愿,将喀尔喀封号改为清朝封爵制度,依次授爵,并依内蒙古四十九旗之制,在喀尔喀蒙古三部同样实行盟旗制度,编为左、中、右三路,划分三十四旗,接受清王朝的统一管辖。同时,赏赐了在平定噶尔丹之战中立功的蒙古官兵,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,检阅满洲官兵和古北口绿营兵,以显示清王朝的军事实力。

会盟之后,清政府在靠近木兰围场“川原平衍,水草清溢”的多伦,按蒙古族宗教

习俗,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喇嘛庙——汇宗寺,进一步密切了清廷与喀尔喀的联系。此后,喀尔喀首领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每年都要到木兰围场朝见康熙。康熙帝也常到汇宗寺接受蒙古部长的述职。至此,清廷实现了“施恩于喀尔喀,使之防备朔方”的战略思想,加强了北部边防。

乾隆之时,清帝先后在木兰围场接见了臣属清朝的四卫拉特台吉噶尔藏多济、哈萨克族使臣都勒赫勒、东布鲁特使臣车里额齐和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的土尔扈特部众。

土尔扈特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,明朝末年开始游牧于额济勒河(今伏尔加河)流域。由于不堪忍受沙俄的压迫,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,首领渥巴锡汗率土尔扈特、和硕特、辉特、都尔伯特、厄鲁特等部众四十六万户,毅然踏上了归国的征途。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迁徙,摆脱了俄国军队的追阻,战胜了茫茫沙漠的困厄,以三十多万人的伤亡作代价,终于在第二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土尔扈特部众的爱国热忱和民族牺牲精神,深深感动了清廷。乾隆帝在木兰围场的伊绵峪接见了首领渥巴锡一行,破例用蒙古语同他交谈;置宴并赏赐鞍马、黄辮等物品;分封渥巴锡一行汗、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台吉等爵;还举行马戏、赛马等大型娱乐活动。同时,拨巨款抚恤数十万土尔扈特部众,“口给以食,人授之衣,使就米谷,而资耕牧”,又分其众为新旧二部,各设扎萨克。其后,又在热河行宫的万树园举行大型庆祝活动,并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建立了刻有《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》、《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》两通巨型石碑,以满、汉、蒙、藏四体文字记载了我国民族史上这一可歌可颂的爱国壮举。

清代前期,木兰围场为我国多民族的团结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。一度游离清朝的蒙古诸部,在历经种种曲折之后,终于又回到了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大家庭。清政府